

浙江区域增长极的成长模式与可持续发展

陈自芳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 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该文分析了浙江区域增长极的成长主要以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为基础,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以体制改革的区域效应为基础的内在机理。目前, 特定的增长极成长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是, 先发体制创新的差异性优势将逐步减弱; 不平衡推进形成的高成长突出区域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 我省传统产业面临各方面替代和市场竞争的挑战和风险; 物质资源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在分析了不平衡推进与统筹协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促进统筹协调、构造可持续的强劲增长极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浙江; 增长极; 模式;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81(2005)01-0008-07

改革以来, 浙江经济具有十分明显的增长极特征, 区域增长极推动了浙江经济 20 余年的高增长, 但目前也面临若干突出的问题。本文研究浙江增长极的成长模式、特点及所面临的问题, 探索构造可持续的强劲增长极的对策, 以求教于同仁。

一、浙江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成长与扩展模式

(一) 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空间布局

浙江经济发展是在原有较低的基础条件下, 主要依靠内生性、自组织的体制创新, 以不平衡推进、模仿为主及相对粗放的方式, 在传统生产领域形成的强劲的增长极。

运用增长极理论分析浙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浙江对于全国而言是一个强劲的大区域增长极; 二是在浙江省内, 分别布局在“三轴三带”①内的区域增长极一批经济强县及其组合; 三是对县域经济而言, 是一批经济强镇形成主要的增长极。

首先, 浙江在全国显现出一个强劲的大区域增长极的特征。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 浙江通过发挥先发市场化的优势, 取得了高增长的业绩, 2003 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9 730 元, 从 1978 年的全国第 12 位上升到第 3 位, 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农村人均纯收入 5431 元,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13 180 元, 分别在上海、北京、天津和上海、北京之后, 列第四和第三位。1978~2003 年 25 年中, 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13.1%, 高于全国平均值 3.8 个百分点。作为一个资源小省和国家投资缺乏的地区, 浙江的高增长主要靠民间的自发投资, 在传统轻加工业领域, 以遍地开花的小企业为主体, 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形式, 形成了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强大动力, 拉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高增长。在全国各省市中, 浙江的非公有经济和市场化机制具有明显的优势, 也是浙江作为全国省一级的大区域增长极的鲜明特色。

其二, 在浙江省内, 布局在“三轴三带”的一批经济强县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构成全省增长极不断扩展的主要动力与支撑实体。2002 年全省 26 个发达县市以占县域 52.7% 的人口, 创造了占县域总量 70.4% 的国内生产总值。近几年, 经济强县(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均在 12% 左右。经济强县(市)政府所在的城镇, 已初步形成有竞争力城市的基础和条件。

这些区域增长极通常以“经济强县组合”的方式构成。我们按照改革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形态,将全省分为三个区域,即所谓“三轴三带”:沿沪杭甬铁路的环杭州湾经济带,由于其原有经济基础相对较高,为“先发的发达地区”;沿甬台温高速公路的温台沿海经济带,由于其主要通过改革开放取得十分显著的高增长,为“后发的高增长区域”;沿浙赣线和金温铁路的浙西南“金衢丽”经济带,为“潜在的新增长区域”。在这三个区域,经济强县组合的密度有极大的差异,但是其组合方式和对区域经济带带动的方式是相同的。

我们以地市级的城市市区,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浙江 26 个全国经济百强县作为“经济强县组合”的构成主体,由于现实情况下行政区仍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以上三个经济带,“经济强县组合”的布局具有基本与地市级行政区相一致的特征。

1. 在环杭州湾可以归结为四个经济强县组合

第一,杭州组合,包括杭州中心市区及萧山、余杭、富阳和湖州的德清县;第二,宁波组合,包括宁波中心市区以及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象山县、奉化市;第三,嘉兴组合,包括嘉兴市区及海宁市、桐乡市、嘉善县、平湖市、海盐县;第四,绍兴组合,包括绍兴市区及绍兴县、上虞市、诸暨市、新昌县。以上增长极显现出高度密集、产业专业化及关联性强,产业集群遍地开花的特点。比较典型的如嘉兴市区下属五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前 50 强,宁波和绍兴都是除一个县外全部进入百强县。杭州和宁波市区作为两个特大型城市市区,其产业层次要比经济强县高,规模经济要比经济强县大,尤其是其经济开发区包含大批省和国家的高层次性项目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具有对全省的产业带动能力及技术先导作用。因而从总体上而言,环杭州湾的以上地区整体上形成了具有全省导向性和带动作用的高梯度区域。

2. 在后发的高增长区域温州和台州沿海经济带,可以归结为两个经济强县组合

第一,温州组合,包括温州市区及乐清市、瑞安市;第二,台州组合,包括台州市区(黄岩、路桥、椒江区)及温岭市、玉环县。这两个组合虽连在一起,但是分别对温州和台州两市产生带动作用。温州和台州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具有典型的温州模式特点,他们自发的来自于民间的私营经济力量曾发挥了对全省体制创新的典型示范作用,引起全国关注。其产业带动的范围遍及温台地区,突出体现了区域增长极的重大作用。

3. 在相对欠发达的金衢丽经济带,目前为一个经济强县组合

包括金华市区及义乌、永康、东阳市。其中义乌商贸流通业发达,它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性采购中心,该区域优势明显的传统特色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中心密切联接,生产和流通的互动日益强化,显示出很强的活力。这一经济区的衢州和丽水有着全省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因其目前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低,在这样一个潜在的新增长区域,已有的经济强县组合既承担着带动区域发展的重任,也展现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经济强县组合具有以下特征:

(1)一个组合通常以一个大城市(地级)为中心,地域相连,形成密切相关的城镇体系,大多处在同一个流域水系,依托同一条铁路、高速公路和其他网络轴线,在文化、语言特征上也有共同性。例如嘉兴市区及五个强县不仅在行政上互相连接,而在城市与乡镇、乡镇与乡镇之间形成密切的经济协作和市场交换关系;五县同属于运河水系和沪杭铁路、高速公路运输体系之中,文化语言等方面有明显内在统一性。增长极内部的同质性有利于分工协作的发展和优势的扩散。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显示,以同质性为基础,模仿和创新相结合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优势扩展进程,是强县经济得以在一个区域内广泛形成的重要原因。

(2)在产业上,通常围绕着某几个主导或支柱产业,形成专业化产业区,具有特色产业比较优势。我们对三个经济带进行

比较:浙东北主要以纺织、服装、化纤、皮革、制药、造纸、机械等产业在全国占有优势;温台经济区主要以机械、电器、日用轻工、建材等占优势;金华的组合主要以五金、机械、建材为优势。经济强县的竞争力主要靠“个性产业”的特色,特色就是优势,个性就是竞争力。“一县一业”或几业,形成专业化和规模化优势。特色产业多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例如海宁的皮革产品占全国市场四分之一,嘉善的木业占全国三分之一,嵊州的领带占世界市场的五分之一等。增长极所应有的产业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关联带动和龙头效应在优势特色产业上都能得到体现。

(3)正的外部效应和共享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环境和产业的共同特色,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外部效应,例如,一种通用技术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本地广泛采用,一种新产品信息会很快得到传播并转变为众多企业的生产对象,它们同属一个行政主体管辖,有利于共享地方政府所创造的外部环境,近年来加速进行的产业园区的建设,更有利于外部环境的营造。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既可由各个主体共同建设,也可以共同利用从而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的良好效益。

其三,对县域经济而言,一批经济强镇是其主要的增长极。在经济强县以及其他高增长的县域经济内,都有若干个高增长的经济强镇作为其主要的支柱。它们是县内支柱产业的发源地和主要集聚区,是优质要素的吸纳中心,是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进行组合的良好空间,也是县域内的利润中心和财政资源中心。2002 年全省最发达的 100 个乡镇平均人口 6.82 万人。其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 15.6%,却创造了全省全部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35.9%,财政总收入的 34.1%。平均每个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高达 61.83 亿元,是全省乡镇平均水平的近 5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部乡镇农民人均的 1.5 倍。

经济强镇不仅撑起了县域经济的主体框架,而且对全县产生示范和拉动效应。在经济强县内,往往以经济强镇的产业为主干,其他乡镇或发展起类似的产业,或与其形成系统配套的纵向和横向产业链。前者如平湖服装业产业集群,首先从新仓镇开始发展,由李勤夫所办乡镇企业与日本合资创办茉织华制衣公司,确立了该镇服装强镇的地位,然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服装业向全县扩展,形成目前平湖全市强大的服装产业集群格局。海宁的皮革业也源自长安、斜桥等镇首先形成气候,强大的产业群体辐射各乡镇,打造了海宁全县皮革产业在全国的地位。后者如经济强县诸暨,目前比较突出的有五大强镇:店口镇以五金机械为主,枫桥镇以服装业为主,大塘镇以袜业为主,山下湖镇以珍珠业为主,次坞镇以建材业为主。这五个强镇人口为 26.63 万人,占全县人口的 25.2%,而其国内生产总值为 69.94 亿元,占全县的 34.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63 万元,为全县平均值的 1.4 倍。这五个强镇承载了全县主要的支柱产业,作为县域增长极,形成对全县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县各乡镇发展起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的配套关系,促进了各乡镇经济的发展。

浙江经济强镇作为增长极,总体依赖于块状特色产业中产业集群的发展,它可以视为增长极的核心组织基础。集群的基本优势在于:第一,围绕着某主导产业和产品优势集聚起来的相关产业,构成聚集经济效应。第二,集群之间的密切分工和协作高度细化和紧密,决定了生产的高效率,专业化有利于降低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第三,集群形成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共享机制,可以共同建设和利用基础设施和服务机构,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要素投入瓶颈和利用的规模效益问题;分享相关技术、信息,有效利用人才,使各种要素在集群中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第四,集群内部形成有序竞争所构成的压力,推动企业不断创新。第五,由专业化分工而形成的单一产品规模效应和由相关企业大规模集聚而形成的综合规模效益,都有利于降低成本,形成独特的市场垄断性优势。

总之,浙江以经济强镇为基础,经济强县及其组合为单元,从浙东北、温台到金衢丽经济带呈现梯度扩展的增长极格局,是一种不平衡的格局,是改革开放 20 余年不平衡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二)浙江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机理

1. 从体制效应的角度看不平衡发展

任何一种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不同区域的强度是不同的,在一种体制下,某些区域容易产生发展驱动力,而另一些区域则易

受到体制的抑制;换上另一种体制,情况又可能相反,原来受到抑制的区域可能产生很强的新的动力机制,赶上甚至超过原来的发达区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和政策变化是以一些区域的加速增长为标志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因。概括起来,体制改革的区域效应包括以下五种:1)利益驱动的区域效应,使那些在旧体制下利益动力受到压抑的区域在争取“先富”的强大利益机制下加速发展。2)所有制改革的区域效应,使那些原来国有制比重很低的区域通过多种所有制的“多轮驱动”构成经济发展的主动力。3)农村工业的区域效应,使一些农村工业发展潜力巨大、农民自主地向二、三产业进入意识较强的区域,通过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现跳跃式发展。4)市场化及对外开放的区域效应,使那些积极培育区域市场并努力向国外市场进军的区域,更早、更多地得到市场化动力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推动,获得高增长和高效益。5)消费品需求拉动的区域效应,使那些善于迎合消费潮流变化,不断灵活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区域,更多地受到改革以后急剧扩大的需求的拉动而实现高速发展。总之,不平衡发展在客观过程中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一部分人先突破原有体制,在体制外进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体制性的多种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区域的非极化不平衡发展,取得了缩小区域总体差距的效果。

2. 从所有制角度看不平衡发展

我们比较改革以来浙江省的国有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国有工业产值以年均 6.9%的速率增长,个体私营经济则以年均 63.7%的速度增长,结果到 2003 年,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仅为 5.4%,而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 80%以上。显著地反映了改革以来浙江工业增长以非公经济为主的特点。非国有经济能以明显高于国有经济的速度和效益发展,凭借的是其体制和机制的优势。发展的不平衡,源于体制的不平衡。

3. 从产业角度看不平衡发展

改革以来由于补偿性消费需求的急剧增长,浙江传统上有一定优势的较低层次的一般消费品加工业成为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柱。纺织、成衣、轻工、食品、以及机电产品等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以这些行业为主体,整个第二产业增加值 1978~ 2003 年以年均 16.5%的速度增长,而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为 4.2%;第三产业为 13.6%。从 1978~ 2003 年,各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是:第一产业从 38.1%减为 7.8%,第二产业从 43.3%增为 52.5%,第三产业从 18.6%增为 39.7%。

4. 从城乡经济看不平衡发展

改革以来,浙江城乡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农村变化要大于城市。农村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西方人称之为“增长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缩影。乡镇企业诞生在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农村,它不可能得到计划配给的必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进行资源互换是其唯一的选择。本来不利的条件,反而成为有利其发展的因素。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强,计划的比例日益缩小,乡镇企业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各方面不平衡往往是相互交叉、互动式演进的,某一范畴内不平衡的强势,往往引出另一范畴内的强势,强势相互迭加,形成顺应市场化改革和多元化潮流的“突进性结构”,创造了高增长的业绩。在未来进程中,集中体现改革以来不平衡发展中的强势因素的各种新生事物、高增长区域、优势企业和自主创新群体,仍将担当开拓的重任。我们要解决不平衡状态下新生事物本身存在的及由不平衡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在新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推进新的非均衡发展。

在西方国家,增长极理论及战略的运用一般是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在某一空间培育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促进区域的协调。然而在浙江改革进程中,增长极的形成主要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推进的,在增长极的初期阶段,其能够顺利成长,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采取放松管制政策的结果。在旧体制的规则下,作为规则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自然不可能公开支持非公有经济以及任何突破旧规则的市场化行为,但是处在基层第一线的乡镇政府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化巨大生命力,采取一种默认的方式任其发展。在保持原有体制、职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政策变通或对上级要求敷衍无为的形式,事实上支持了新增长因素的扩张与衍生。当其发展到一定时候,又以承认既成事实的方式给新生的非国有经济颁发“通行证”。例如发放个体工商户

和联户企业的营业执照,对新生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承认它的集体经济性质,以及通过戴“红帽子”的方式使之在制度内合法存在。现在看来,这种“无为”是“有为”的表现,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创新过程,当然这种创新的主体是民间的力量,而政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在增长极的进一步发展阶段,由于体制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地方政府可以以正式制度的方式,支持和推动新生事物的成长。这时,“默认”已无必要也远远不够。由于新事物快速成长阶段的复杂性,也需要政府更多的直接加以培育,包括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直接推动旧的体制外新生事物的成长。浙江新的增长极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大发展,是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蓬勃自发成长与政府有力的扶植推动相结合的结果。当然政府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或者出现政府官员以政绩标准指导决策导致政府失灵,对市场机制和经济运行造成损害。但总体而言,新增长极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未来的统筹协调、构建差异性竞争力的进程中,浙江增长极的培育有赖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维护、保障和调节功能,以利于增长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并对区域经济形成有力的带动作用。

二、特定的增长极成长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浙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加快发展,形成了特定的增长极成长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充分发挥了在全国领先进入市场化和所有制多元化,尤其是非公有经济高速发展的体制优势,以多方面不平衡推进方式促进了一部分领域的优先高增长,进而带动全局加速发展;2)高增长形成了先发性的市场扩张和产业规模优势,但这种优势主要建立在模仿为主、同质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基础上;3)规模扩张以大量的投入为前提,体现为粗放式的增长,对物质要素消耗依赖性强,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相对不足。

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买方市场下的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新问题接踵而来的新形势下,这种成长模式所带来的新挑战也更加严峻。

第一,由于全国各地的体制创新不断深化,浙江改革以来所拥有的先发性体制创新的差异性优势将逐步减弱,而创造新的体制优势的难度加大。

与全国多数省份相比,浙江形成了先发性体制创新的差异性优势。尤其是民营经济组织充分动员了本土资源,通过自组织的多种经济形式率先进入市场,是浙江“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型经济运行模式取得成功的根本支撑条件。但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在加快进行,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浙江在体制上已没有原来那样的相对优势。浙江大量民营企业的组织制度有待完善;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产权交易和融资渠道不畅;政府职能转变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目前某些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化,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既得利益集团因素而造成的深层次、全局性问题的阻碍,改革和创新的难度显然会进一步加大。

第二,以不平衡推进的方式形成高成长,也突现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在不平衡推进中,增长极的核心区与非增长极的边缘区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改革以来,处于低水平的丽水、衢州,以及温州、金华等地市内的一些欠发达县的增长速度多低于全省平均值,相对水平进一步下降。这些地区不仅受到先行发达区域“极化效应”的影响,而且要受到后起高增长区域“新极化效应”的影响,优质生产要素不断流出,依靠其自身力量很难改变这种处境。

二是目前产业结构就中长期而言也呈现某些不协调的局面。浙江在改革进程中主要依靠轻工业产品强大需求的拉动,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及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则相对滞后。基础产业的技术要求较高,民营企业一般较难进入,当时体制

对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也加以限制。在产业结构中,以低端产业和产品为主,产业层次偏低,结构离散度大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大量占用土地造成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薄弱,潜存着风险。

三是城乡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浙江在改革初、中期是以农村工业高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这样的不平衡态势取得高增长业绩的,这样的不平衡缩小了城乡的差距,实际上可看作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不合理格局的一种统筹协调,不平衡本身就是统筹协调的过程。但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村工业普遍向城镇集中,工业园区围绕城镇发展起来,农村的优质要素不断流向城镇,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未能根本改变,农村居民在身份地位和待遇方面受到歧视,失地农民问题更加突出。这些情况导致城乡差距又有所扩大,新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突出矛盾。

四是在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关系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越位、滥用或缺位,效率低下乃至以权谋私的情况仍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导致不安定因素,影响到经济社会稳定。由于产业结构对资源的消耗很大,污染严重,多年来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广泛存在,影响到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存环境的优化。

第三,由于高增长主要建立在模仿为主、同质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差异性竞争优势,在强大的国内外竞争面前,如何应对各种“替代”所带来的挑战,是十分紧迫的问题。

我省传统产业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1)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高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优质乃至名牌产品的强大竞争压力;2)在技术创新加快的条件下,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趋势将不断加强,其产品的质量可能更高而成本更低,从而使我省依托于廉价劳动力的专业化比较优势逐步削弱;3)随着我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国内区域的更低价格产品的竞争,同样可能使我省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目前浙江的部分企业就有两种外迁的倾向:1)迁往上海等技术、人才和管理水平更高的地区,以提高差异性竞争力;2)迁往各种要素供给更加丰富、成本更低的地区,以进一步提高同质化的比较优势。两者都是上述替代效应所产生的必然过程,所蕴含的是对浙江经济的长期挑战。因此,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努力扩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同时加大力度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我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比较优势转化为与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紧密结合,以技术垄断、规模经济、品牌经营为主导的竞争优势,当然这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四,由于高增长主要体现为粗放式的扩张,对物质要素消耗依赖性强,目前面临物质资源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

电力高度紧缺,水、煤炭、成品油、交通运输及土地等供给也都呈现紧张状态,其中部分地方出现“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的现象。原材料购入价与工业品出厂价形成“高进低出”的走势,2003 年两类价格分别上涨 5.8%和 0.6%,涨幅差达到 5.2 个百分点,对我省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企业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力也出现短缺,食品、住房等价格上涨使生活费用增大,形成名义工资提高的压力,加之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对 AS8000 社会责任标准强制认证全面实施,出口企业工人工作与生活条件提高带来的成本上升,都会使劳动力不再“廉价”,将会直接缩小我省许多企业的赢利空间。其反映的同样是要素制约的矛盾。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高消耗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实现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预期目标。

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都强调,工业生命周期的客观规律促进了区域间产业转移。当经济发达地区初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趋向于成熟阶段时,就可以逐步向低梯度的边缘区转移,对于那些本身资源不足,靠加工能力取胜,现有产业又对资源依赖性较强的发达地区,更应该首先将较多消耗资源的成熟产业转移出去。同时必须加强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发展资源消耗少的智力型经济、“头脑经济”或“软性经济”,这些高层次产业的发展又能够使发达地区有效保持其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目前浙江部分企业的外迁正是这种客观过程的体现。我们不应该阻止这些顺应客观规律的企业行为。但在现有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传统的行政分割体制和干部出于政绩需要热衷于规模扩张和“GDP 攀比”的条件下,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面临的众多障碍。

三、不平衡推进与统筹协调之间的辩证关系

面对以上问题,正确处理不平衡推进与统筹协调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再创造体制和产业竞争力的新优势,还是从解决不平衡所带来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平衡推进与统筹协调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在增长极理论中,这种关系表现为极化效应和扩展效应的关系,也是核心区与边缘区发展相互协调的关系。为了使不平衡推进的增长极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竞争力提升,同时又拉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这种辩证关系可以概略地通过表 1 加以说明。

表 1 不均衡推进与统筹协调的互动关系

	不平衡发展	统筹协调
1.	加强瓶颈领域,克服瓶颈制约	形成整体推进,健康有效发展的局面
2.	形成优势领域的专业化竞争力	保障竞争力的系统性和结构优化
3.	形成高成长性、有带动力的产业领域	保障以贯联性和产业链带动相关领域发展
4.	形成现实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主体	保障潜在未来资源供给来源的稳定性成长
5.	形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	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第一,不平衡发展首先着眼于加强国民经济的瓶颈领域,克服瓶颈制约。通常瓶颈领域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构成关键性的制约,因而集中动员各种要素解决瓶颈问题,就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首先集中解决交通、通讯问题,因为当前的交通和通讯已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健康有效运行的重要瓶颈。这样的不平衡发展会为经济的整体发展打开局面。在解决瓶颈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统筹协调,就可能形成整体推进,健康有效发展的局面。

第二,以不平衡的方式优先发展少数最具优势的领域,形成独特的竞争力,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拥有挑战竞争对手的独特实力和相对垄断性的创新能力,例如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拥有独特的知识产权。虽然我国现有许多领域科技和经济实力还较薄弱,但是有了这些具有优势和竞争力的领域,未来才谈得上把整体科技水平提升上去。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以具有突出竞争力的领域为龙头,其他领域与其形成良好的支持和配套,避免经济运行结构的失衡,保障优势领域能够持久地发展提升。

第三,以不平衡的方式集中发展一批高成长、具有带动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些产业应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是规模能迅速扩张的朝阳产业,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则是建立高成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产业链与关联性,强化高成长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例如浙江的纺织、机电、化工、医药等产业,通过协调和其他产业的关系,能够将大批传统产业同步带入高成长性和扩张性阶段,并迈向世界市场。

第四,以不平衡方式促进一部分地域优先发达和富裕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储蓄、外汇、资本、技术和财政等各种要素的积累,这些地域有很强的能力对其他地域形成援助、示范、支撑作用,从而对整体形成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主体。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通过先发达地域带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域,先富帮后富,促进各区域和领域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意义在于后发地区是未来生产要素供给的巨大来源,通过统筹协调保障这些潜在要素供给源的稳定性成长,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五,以不平衡方式促进一部分地域优先发展并优先得到较大利益,也是对高效率的工作和劳动强化激励机制的过程,因而不平衡发展事实上也就是形成高效率的动力机制的过程。这种不平衡所形成的示范作用,必将使全社会形成万马奔腾创造高效率工作业绩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则是兼顾社会公平性,避免差距过大,保障社会稳定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统筹协调事实上是兼顾相对低效率或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但这并不是鼓励低效率。因为现实社会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匀、个人能力先天性的差别以及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上难以避免的不完善之处,会造成同等劳动和同等能力下的收益不平均,这种在市场先发性、一次调节基础上的不平均,需要一种弥补机制来加以调整。以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向于弱势群体等方式进行的统筹协调,正是这种弥补机制,以此保障社会的公平,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反之,只有经过统筹协调才能创造持续的不平衡推进的条件。不平衡发展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有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或因为先天不平等的原因(如占有资源不平等)形成的不公平而产生如社会不稳定等,以及由于不平衡发展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系统内部原有稳定协调的关联性被破坏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社会整体的稳定发展就难以保障,甚至生存都发生问题,更谈不上新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来总体是通过不平衡发展的方式取得巨大成就的,但另一方面,目前积累的诸如区域、城乡的差距过大以及二元结构,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对内与对外开放的不均衡等问题,又都可以从不平衡发展模式中找到原因。中央关于加强五个统筹的思想,就是对原有不平衡的修正。修正后促使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新的不平衡战略的实施。例如城乡关系,如果不能解决八亿农民的收入提高,社会消费就无法提高,总需求制约将长期存在,阻碍经济发展。在这样基础上进行不平衡发展,只会导致总量失衡、结构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

四、统筹协调,再塑优势,构造可持续的强劲增长极

浙江针对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统筹协调,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和新时期的要求,再塑浙江体制和产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以构造全面可持续的强劲增长极。2003 年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的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即“八八战略”)就是针对新形势、新要求,保持浙江强大竞争优势,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纲领。八八战略的实质,一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竞争的新形势下,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重新塑造浙江在各方面的新优势,以保持浙江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二是以统筹协调的理念和方针,解决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进步相统一,促进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进程中,应注重从以下方面加以落实。

(一)进一步加强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区域竞争力

体制创新首要的是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省委、省政府于 2004 年 2 月发出《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的目标是,构筑“增长方式集约化、产业组织合理化、产权结构多元化、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格局。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除国家明令禁止以外的所有领域。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政治待遇、政府奖励、职称评聘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人才公平对待;努力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疏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推进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增强商品市场活力,提升专业市场层次和水平,积极培育全国性和区域性的人才市场和技术市场。紧紧把握加入 WTO 后金融深化改革的机遇,努力改变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现状。另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先进制造基地,加大力度推进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稳固的竞争优势。2003 年 9 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出台,省政府紧接着发布《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从七大方面采取 30 条相关政策,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工作的在全省各地、各部门顺利开展。知识、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首位要素。浙江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产业结构以“两头在省外”的加工业为主,竞争力关键在于人力资源。从这一实际出发,全力以赴培养和吸引人才更加显得重要。围绕“科教强省”和“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改进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科技资源配置结构以适应新的产业发展需求。增加科技投入,加大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的力度。注重将利用外资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相结合,将吸纳国外产业的转移与自身产业不断升级密切结合,与培育先进制造业基地相结合,注重吸引高质量、高附加值、高层

次的国际产业转移。

(二) 全力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实施促进城市与乡村、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统筹协调方针和政策

2004 年 1 月 17 日, 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意见》成为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纲领, 推进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它包括 10 个方面 29 条, 主要有: 进一步推进农业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 努力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 增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 全面提高农民就业致富能力; 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推进城乡配套改革, 促进城乡一体化新体制的建立; 加快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 以缩小地区差距,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激发欠发达地区所蕴藏的潜能, 以谋求东西部联动、共同发展。

未来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调控, 仍然必须充分发挥浙东北高梯度区域的优势以带动低梯度区域。增强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 浙江大量新崛起的产业“低小散”特征较为明显, 迫切需要以较高层次的产业扩散和技术、管理的带动实现升级。政府应加强对后起区域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 促进其规模化、集中化、高级化的进程。同时, 改革以来, 部分县、乡镇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全省平均值, 政府有必要对最低水平地区适当加大扶持力度, 动员全社会力量对贫困区域进行扶贫攻坚。

针对不平衡发展中基础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 应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使农业从弱质产业变为强势产业, 从“靠天吃饭”变成“靠科技吃饭”。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升级作为未来几十年浙江经济的重大任务, 需要电力、石化、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相应发展, 立足与国内外进行资源互换仍将是解决的基本途径。但考虑一些不可移动的因素(如交通等)以及互换成本较高的基础产业还应尽可能实现自给。不但应进一步消除民间企业和外资进入基础产业的有形和无形壁垒, 而且应给予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的适当优惠。

(三) 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与资源、生态结构之间的统一, 发展资源消耗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从根本上解决要素瓶颈制约的问题, 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全面深入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与解决要素制约是高度一致的。全省上下将资源的巨大的压力转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动力, 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促进科学、有效益的发展。根据要素制约及宏观经济紧缩的形势, 对投资、生产及存量结构进行较大力度调整。为打造一流发展环境, 2003 年省委省政府决定投资 3000 多亿元, 全面实施“五大百亿”工程, 包括“百亿基础设施建设”、“百亿信息化建设”、“百亿科教文化设施建设”、“百亿生态环境建设”、“百亿帮扶致富建设”工程, 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充分保障。

未来浙江仍需坚定不移地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基本方针, 避免强调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而忽视扩大第三产业比重的要求。同时尽可能回避大量消耗浙江紧缺的能源、原材料、土地、水资源的产业。对于现有这类产业可设法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相关资源丰富的外省市地区, 而鼓励其总部保留在浙江。把“减少消耗也是重要的贡献和政绩”作为口号, 通过制度建设、价格杠杆和全民教育方式, 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的机制。根据浙江的资源特点, 大力开发低消耗、遍在性、清洁的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凭借浙江的优势对外进行合作, 将浙江的资本、加工能力、人力资源优势, 和中西部的自然资源要素优势结合起来, 通过建立“跨地区投资-自然资源供应”的双向互动关系, 形成平等互利的合作格局。在资源丰富的外省市建立“经济飞地”, 形成资源的加工增值产业, 保障对我省的资源供应。

为促进人和自然协调发展, 以生态市、生态县建设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作为制度保障, 全省将建立健全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 按照绿色 GDP 的观念, 探索绿色 GDP 核算, 推行生态审计制度, 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绩考核制度。实行生态保护和建设一票否决制。为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 要大力建设“平安浙江”。具体目标就是要在全省范围内努力实现“六个确保”, 即: 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确保治安状况良好, 确保经济运行稳健, 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 确保社会公共安

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文明氛围。

注释:

① “三轴三带”:沿沪杭甬铁路的环杭州湾经济带、沿甬台温高速公路的沿海温台经济带,沿浙赣线和金温铁路的金衢丽经济带。

参考文献:

[1]方民生,等.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张宗和,等.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4]解力平,等.浙江私营经济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5]朱华晟.浙江产业群[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6]陈自芳.不平衡推进与高增长——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7]陈自芳.不平衡发展与统筹协调相结合的辩证思想——兼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A].浙江省委宣传部.邓小平理论与浙江实践[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